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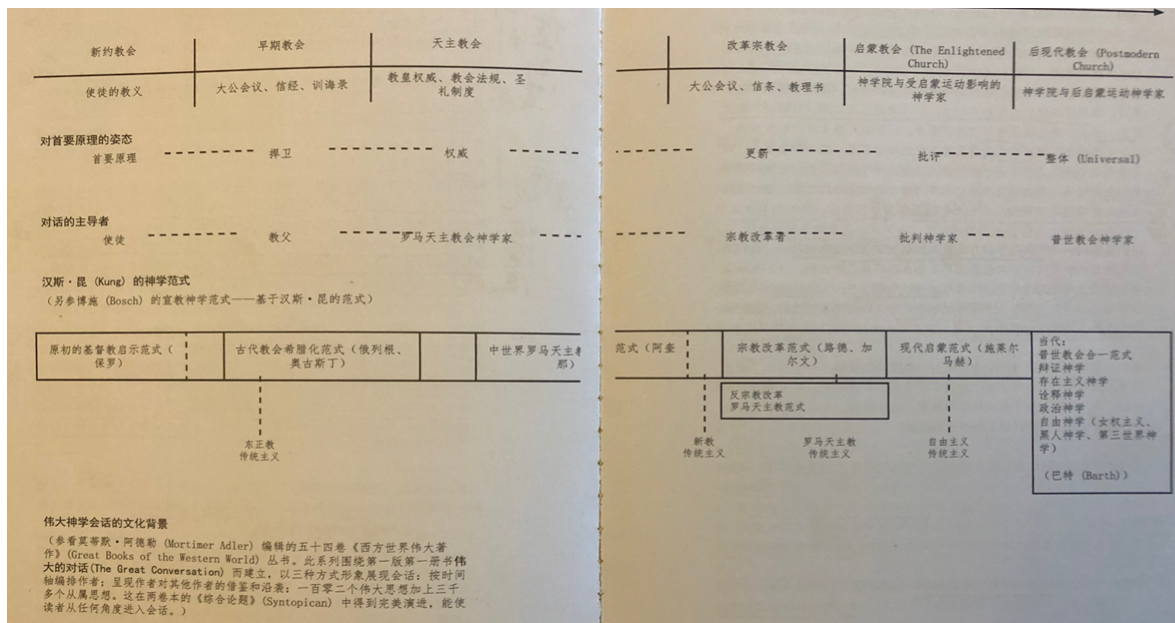
# 从历史上的教会形态看现今中国教会

徐志秋教授

今天我主要介绍一些历史背景，关键概念，并探讨教会，社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经过了很多次的范式转换。我们先勾勒出一个大的历史图景，然后找出贯穿其中的一些原则，希望能对中国的家庭教会有一个借鉴和帮助，同时我们也要清楚中国现在的政教关系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和阶段。

## （一）教会重大阶段和神学观念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表，它显示了教会在历史上的不同形态（选自安提阿材料）。



这张图表基本上把两千年历史上影响教会的根本理念和神学思想分成了几个大的段落（这些也就影响了教会跟社会的关系，跟政府的关系）。新约教会是指使徒还在的那段时间，公认的是使徒约翰离世之后，进入早期教会。早期教会涌现出很多的教父，不过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清楚。然后进入天主教会，这个中间的分野是《米兰敕令》颁布，和横跨这段时间的一个有名的教父奥古斯丁，大概是四世纪末五世纪初。1517年马丁路德在威丁堡教堂贴上了《九十五条论纲》开始了宗教改革运动，进入到改革宗时期。在这一时期，天主教为了应对这次宗教改革做了很多调整，慢慢的进入到启蒙时代的教会。以康德写《实践理性批判》开始，十九世纪初启蒙运动之后，最后进入后现代教会。但是这条分界线不是很明显，尼采，法国利奥塔对现代进行批判，这个过程教会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范式转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历史的线索贯穿在其中，也可以看到各个时期的教会有它不同的特点。

新约教会时期是以使徒作为主要人物，承担主要角色；早期教会是教父；天主教会是罗马天主教会神学家；改革宗教会是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启蒙教会是批判神学家出现很多的代表人物；德国的自由派神学席卷了整个西方的教会；最后进入普世教会的神学家。这个时期教会不仅仅在西方也进入了全球的东方和南方，教会的重心从欧洲进入非洲，从非洲往东移，印度和中国的教会日益增多，同时南美的教会也不断的增多，整个教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 （二）历史上教会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

下面我们来看不同的范式之间有什么样的特点。初代教会政教关系的张力很大，教会处在逼迫之中；天主教会时期，天主教成了国教，教会是为政府服务，政府和教会成了上帝手中的两把剑，称为双剑理论；改革宗教会时期，教会开始分裂，路德宗是国家宗教，但是卫理公会或者其他的宗派也是长期的受到逼迫，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加尔文所在的日内瓦；启蒙教会时期教会又被慢慢的边缘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启蒙运动在中国出现的晚一些，但是也出现了非基运动和非基督教思想。

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的一个自由派的神学家特尔慈（Ernst Troeltsch），他对圣经的观点我本人不是很认同，但是他的头脑很清晰，非常理智。他纵观教会近两千年的历史，写了一本书《The Social Teaching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1912)》，这本书重要的主题是梳理了历史上的政教关系，以及其中不同的模式，观察基督教会，基督信仰，在各个历史时期是怎样跟当时的政府互动，跟当时的文化融合。他试图找出其中以一贯之的原则，然后用到自己所处的时期。这本书写于 1912 年，当时的西方基督教发展的非常好，科技经济很发达，后千禧年主义很时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到来，社会上充斥着乐观的情绪，但是特尔慈认为危机会很快来到。他开始思考教会在未来的动荡里面如何自处，如何发展，这个也是整本书的主题。特尔慈分析的是初代教会到他所处的时期，大约 1800 年的教会历史。他分析的对象是欧洲西部的教会，不包括美洲，不包括东方教会，也不包括南部的教会，但是如果把他的研究处境化，他的分析基本是准确的，值得借鉴的，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本书里他所阐述的几个主要观点。

虽然当时的社会上充斥着乐观的情绪，但是他对基督信仰的未来表示担忧，并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据正在解体，基督信仰在接下来的时间会面临许多的挑战和冲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准确的。二十世纪基督信仰在教义上受到现代思潮的挑战，而在政教关系上也处理的常有失误，尤其是二战时和纳粹德国的关系，自由派对集权政府下的关系的处理的确值得商榷。特尔慈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政教关系，他关切教会的未来，不过他是深受现代性影响的自由派学者，值得尊敬也很可惜。他在许多基本的教义上偏差很大，例如不相信基督复活和圣经无误，他有自己的信仰方式，但他对教会的关切是真诚的。他认为 1800 年以来教会不断的面临与政权互动和如何影响社会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那么教

会的前途堪忧。为此，他特别梳理了 1800 年的教会历史，希望从中找出最佳的政教互动模式，以及教会如何最有效地影响社会，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目前需要讨论的主题。

特尔慈关心的核心议题是教会如何与社会主流力量共舞互动，形成合一，持久，繁荣的文明，这个文明不仅包括教会的兴盛，也包括整个社会持久的繁荣。为此他把教会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分别进行研究总结，这五个阶段是：初代教会、中世纪形态、路德宗形态、加尔文宗形态、浸信会形态。

在研究过程中，特尔慈惊讶地发现教会在各种社会形态中产生千差万别的反应模式，教会适应环境的生命力富有创意、不拘一格。教会基本上对于各种形态的反应是没有定式的，是很实际的，非常有创意的，是法无定法，水无常形的形态，或者是因为教会本身的形态有生命力，有创造力，人的理性无法总结出一套规律，这也是他梳理了 1800 年教会历史后得出的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教会被激发以后所产生的反应，人是无法预期的。特尔慈特别注意其中两种政教关系模式：一是中世纪模式，二是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模式。教会在这两种模式里与社会深度融合，对这两种文明形态起到正面主导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他主张的是政教合一的模式，教会是怎样在政权的势力下面对社会进行影响，把基督教义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构建社会，成为社会依托的主流力量。中国家庭教会目前所处的时间段对应的是初代教会，那么会不会走到政教合一的模式呢？如果基督徒的数量多到一个程度，是有这个可能，但是政教是分开好还是不分开好，这是很复杂的一个议题。

特尔慈把中世纪与初代教会进行对比，他认为初代教会处于社会边缘，与社会主流张力巨大；但阿奎纳所代表的中世纪基督教思潮，达到了教会与社会的深度融合。中世纪虽不理想，我们现在认为中世纪是个黑暗时期，但它的社会长期稳定，现代社会文明的种子基本上都是在中世纪孕育出来的，社会稳定，文明才能孵化才能成长。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持续超过千年（330-1453，共 1123 年）的高度文明，除了印度，埃及的古文明，很少有一个朝代超过一千年，中国最长的朝代不超过 500 年，这其中基督教功不可没。特尔慈对中世纪的政教模式非常的欣赏，对加尔文主政时期的日内瓦也情有独钟。他认为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神圣社区（Holy Community）；在加尔文的政教关系模式里，无论是教会活动还是世俗生活，都以上帝的荣耀为最终的目的。日内瓦是一种全新的模式，里面蕴含了政治的民主主义，以及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也特别推崇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

特尔慈的结论是教会时常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激发，并由此产生出实用的应对模式。在政教模式问题上，基督信仰并没有固定的程式，而是在一种具有生命创造的力量，在实际的社会形态中发展出全新的应对模式。

在特尔慈之后有一个当代的学者莱图赖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看法。他在中国做过宣教士，在湖南长沙的雅里学院做过老师，回到美国之后当了教授，曾被民国政府授予才育大勋章。他不懂中文却很精通中国文化，是东亚

文化的历史神学家，一共写了 80 多本书，其中有一个系列《基督教拓展史》梳理了教会 1500 年的历史。他对某些历史阶段的描述是最初五个世纪公元 500-950，黑暗岁月中的大衰退，我们不太熟悉这个时期；公元 950-1350，四个世纪的复兴与进取，在这期间，天主教开始大规模的宣教；公元 1350-1500，疆域沦陷及内部散怠。这些是他总结出来的每一个时期的特点。

英国学者华尔士(Andrew F. Walls) 经过对近两千年教会历史的研究，观测到福音宣教有着这样一个规律，“基督信仰的传播并非渐进式的(progressive)，而是链式系列增长的(serial growth)。”也就是说，基督信仰的扩展并非直线渐进模式，而是呈现为时进时退、时盛时衰的系列运动。华尔士认为，这种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成肉身、十字架、属地瓦器等教义所包含的柔弱特质。无论在历史还是在当代，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心脏地带一直在迁移，从前的边缘演变为新的中心。但是以前的中心也变成烧成灰烬的地方，满目苍夷，非常凄凉的处境。这是非线性发展轨迹，它告诉我们教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个时代是不是有为主大发热心的人，或者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能会促成教会大大的发展，但也会因为战争瘟疫，像一战二战，促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土崩瓦解，教会停滞不前，整个世界充满了疑惑。

### (三) 结论

华尔士和莱图赖特对教会史的研究结论，让我们感受到基督徒的时代责任。我们接力传承福音的火炬，一代人的懈怠懒散可以使神国收缩沦陷，而另一代人的砥砺前行也可以带来神国的复兴与拓展。中国福音教会如此庞大的体量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和使命，如果能彼此合一、持守真理、众志成城遵行主的大使命，那么二十一世纪后半叶的教会历史，必会有突飞猛进的荣光。

这些只是人对教会历史的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我们相信整个历史上帝在掌权，同时我们也相信上帝会兴起一代人成就祂的旨意。

---

### 讨论：

Q: 我总结了一下徐教授表达的主要观点是，“教会时常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激发，并由此产生出实用的应对模式。在政教模式问题上，基督信仰并没有固定的程式，而是在一种具有生命创造的力量，在实际的社会形态中发展出全新的应对模式。”“基督信仰的传播并非渐进式的(progressive)，而是链式系列增长的(serial growth)。”

一代人的懈怠懒散可以使神国收缩沦陷，而另一代人的砥砺前行也可以带来神国的复兴与拓展。

Q: 请问徐教授，这次的疫情您认为是个偶发事件吗？

A: 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应对这个灾难，教会也要应对，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聚会，只能在网上聚会，不能一起领圣餐，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我们被关在家里，是否有创意的方式聚会，有现代的科技帮助聚会，可以使各地的基督徒沟通团契，我们上次在网上开展培灵会有上千人参加。这是一个很新的偶发性的事件，教会也在这个过程中摸索，竭力的应对寻找对策，我相信圣灵在其中也有引导，赐给我们智慧，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教会的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我个人相信这个灾难之后，世界的格局会有一个根本性的重组，历史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这次疫情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教会从此进入另一个发展时期，是衰落还是奋进，我们还需要观察。各地的牧师领袖有没有一个合一的看见，我也看到很多的牧者已经在探讨新的牧会模式。我觉得我们是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

Q: 请问徐教授，中国教会的本土神学处在什么样的状态？这次的疫情神给中国教会的启示是什么？中国教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

A: 我觉得中国教会的本土神学还没有形成。这个形成需要一定的基础，首先教会的发展量要到一定的程度，不仅仅是人数，在教会里还要走出一批有思考能力，有洞见能力的人，比如说初代教会神学的形成教义大的发展，那个时期是群星璀璨，而中国教会还处在前期，目前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本土化神学的发展是个自然的过程，当教会面对很多的压力时，会有很多的护教者，在压力逼迫之下产生很纯正的回应，就会留下很多的文献，后人就可以知道那个时代的神学。中国在特殊的形态下产生很多的应对，激发活力，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神学的发展并不是在书斋里想出来的，是在各种的博弈里面有机的生长起来的。